

53/ 第三部分 北京的陷落

55/ I 抵达黄海

59/ II 在宁海州

63/ III 走近北京

94/ IV 帝王之城

142/ V 重返宁海州

147/ VI 北京的春天

156/ VII 皇陵之旅

172/ VIII 北京的陷落

181/ 资料:北京某满大员日记

目录

1/ 译者的话

1/ 序

1/ 第一部分 熊熊燃烧的城市

2/ 公使馆被清朝的队伍包围

6/ 被围困日记 (1900年6月19日至8月15日)

31/ 第二部分 保卫法国公使馆领地 (节选)

32/ 1900年6月11日至24日日记

45/ 1900年8月5日至16日日记

第一部分 熊熊燃烧的城市

法国公使斯蒂凡·毕盛

燃烧的城市



毕盛 (Stephen Pichon) 是克莱芒梭的朋友，后来成为外交部长。毕盛先是当记者，投身外交生涯前成为议员。义和团运动时期，从 1897 年他便作为法国的代表常驻北京。后来，他成为《小报》主编，1916 年把龙德 (Albert Londres) 调到报社，又在 1919 年奉克莱芒梭之命把他赶出报社。

下面的内容节选自他的纪实回忆录《在战斗中》。⁰⁷

07 梅利乾 (Mercator) 出版社 1908 出版。



公使馆被清朝的队伍包围

6月20日至8月14日，公使馆被清朝的军队包围。公使馆人员面对焚烧、枪杀、手雷和地雷展开了战斗。包括军官在内的护卫队由409人组成，另外还有80名志愿人员，配有不同型号的卡宾枪或猎枪。公使馆人员有一门意大利37毫米口径的大炮，一门马克西姆大炮，一挺奥地利机关枪，一挺美国机关枪。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小分队中的前两者，只有极少量的弹药。

与这一小撮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斗争的是5000或6000名中国兵民：他们拥有毛瑟枪或曼利掣机枪，装备可观，枪支弹药的数量充足，而消耗的只是一小部分。他们不仅有众多的义和团员和苦力的支持，还有他们提供的服务。军需药库和食品商店供给充足，大门永远为他们敞开。政府也为他们配备了所有必需品。他们消耗了大小不同的3500发炮弹和数千发子弹。人们不禁要问，被围困的人似乎都被判了死刑，他们是怎么抵抗的？最终怎么被解救的？为了避免屠杀的蔓延，通常需要出现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但这并非人的意志所为，而是接踵而至的意外事件的发生。

如果6月20日所有外交官照原计划前往总理衙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生还，至少无法逃脱中国士兵的枪击。出于偶然，只有德国公使

一个人前往，结果他被杀害了。

如果6月22日坚持驱逐法国、德国、美国 and 俄国的公使馆人员，或晚几天发生这一事件，正如后来发生的情况，英国公使馆在两周内就沦陷了。

如果不是在围困开始时在被遗弃的房子里找到了足够的大米和小麦，便无法在两个月内供养900名避难者和2400名教徒，出现饥荒完全可能。

如果进攻者没有把大部分炮手派遣到天津，而将出色的炮手留在北京，我们便无法躲避大炮的进攻。而且，如果中国人有勇气，真的打进墙内并冲破驻防，我们会被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彻底摧毁。

如果7月17日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停战间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可能受到的损失（与部分停火前遭受的损失相比）会让我们束手无策。另外，所有弹药会在大家被解救前全部耗尽。

如果联军8月14日没有开进中国北京，而是延迟24小时，他们见到的很可能是我们的尸体。中国人在英国公使馆官邸下挖了一个长54米的弹药坑，一旦爆炸，100人会丧生，从而为进攻者打开通往妇女和儿童藏身的地方。他们在城墙上也搞了同样的花样，要炸开俄美的驻防。法国公使馆险些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之所以最终得救，得益于一系列事件，其原因非正常逻辑思维所能解释，也并非得到什么特别关照。我想补充的是，季节对我们十分有

利，但可能给增援部队前进造成障碍。这一年7月，阴雨连绵的天气不见了，除了几次凉爽的阵雨，天气干爽，气温不高。选择中国人有可能弃京而逃的时候援助北京，此决定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可以实现的。

公道地说，日本人的参与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日本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是他们给联军提供了可靠消息。在围困期间，他们成功地将记录我们绝望境况的信件送到了天津。北长街之战法国军队表现得很出色，战斗结束后，日本人没有等待援兵的到来，而是决定继续推进。在意大利分队和法英志愿兵支持下，尽管力量微不足道，日本人一马当先，最终还是从死亡线上将中国的教徒们解救出来，因为他们当时的处境比我们更危险。他们在战斗中英勇机智，一切赞扬之词都相形见绌。军队由史帕（Shiba）上校指挥，他的表现受到嘉奖。

不妨比较一下各分队的损失情况：

人员（含军官）	死亡	受伤
英国 82 人	3	19
俄国 87 人	4	19
美国 58 人	7	10
德国 51 人	12	15
法国 48 人	11	22
奥地利 35 人	4	11
意大利 29 人	7	13
日本 25 人	5	20



部队共53人阵亡，129人受伤，志愿兵共12人阵亡，23人受伤；总共不到500人的队伍，死亡65人，受伤142人。53名志愿兵伤亡人员中大都为日本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法国有3人不幸捐躯：路经北京的拉鲁斯（Labrousse海军上尉，原上海总领事之子、海关署的瓦聂（Wagne），汉口—北京铁路段翻译官昆根（Gruitgehs

在北长街，我们共有30名海军和10名军官，其中5人死亡，包括海军中尉亨利，9人受伤。在北长街修女开办的机构福音堂，意大利有海军10人，军官1人，其中6人死亡，3人受伤（军官在内）。

只有北长街没有经历任何休战，因为，7月17日前，除个别时候，我们的水兵和志愿兵的阵营空空如也。恰恰是从那时起，我们遭受的损失只有先前的1/15。

可怕悲剧的真相至今蹊跷，追究责任的时机还没有到。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有三个人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未来皇位继承人之父端王、甘军的将领董福祥将军（他以极端仇视文明人著称）、协办大学士刚毅。除这些显赫的头号人物，还有影响较小、地位略低的一批人，如山东的李秉衡，在夺取胶州时，他在德国的压力下被解职。

端王、董福祥和刚毅三人联盟自然给慈禧太后施加了压力，但我认为，不能由此原谅并抵消太后的责任。表面上她权力很大，十分威严，实

际上只是这些亡命徒的傀儡。应该说，6月20日至8月15日，义和团在领导北京，“拳手”们抢劫、偷盗、暗杀教徒或百姓，无所不为。这些行为在无与伦比的无政府状态下发生，抢夺者相互枪杀，士兵们还为夺取最好的猎物相互残杀。

欧洲的胜利（尤其是夺取天津）和联军的迫近先后给朝廷上了一课，也给王朝大臣埋下了混乱和不安的种子。以庆亲王为首的温和派和似乎以荣禄为代表的第三党试图阻止这些疯狂行为，避免将大清国引向灾难。

有没有勇气不是区别大臣地位高低的标准，他们完全清楚面临的危险，但希望能明哲保身，任凭公使馆的人置于地雷和壁垒的威逼之下。况且，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胆小鬼的下场：总理衙门的四个人和一位公使在我们的队伍打进城前不久被处死，地点就在侵犯公共权利的罪犯被砍头的地方。野蛮人的这种处罚比任何处罚都更具侮辱性。在被处刑的人中，有两个人（许景澄和徐用仪，前者为原驻彼得堡和巴黎大使）因给董福祥下令杀害的德国公使买灵柩而遭到指控，另外三个人（袁昶、联元和立山）被指控在企图谋杀外国人事件中过分温和。

太后在反攻者面前表现得十分顺从，这让那些受害者反过来认为他们是其中的牺牲品。停战埋下了不稳定和模棱两可的隐患，但也使我们活着等到了考验的终结。我们从中看到那没有硝烟的党派权力之争。他们的进攻被我们击退，每次

进攻的强度可以折射出清政府内部斗争的变化。从端王和他的同党对其统治的信心，或从庆王及荣禄的决心是否略有动摇，我们成为敌人枪杀的目标。政府下令枪杀所有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尤其是所有外交人员，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种种变故和信心不稳定加速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政府枪杀的失败。





被围困日记（1900年6月19日至8月15日）

6月19日

晚5点左右，总理衙门宣布，施拉（Chaylad）代表海军通知交付大沽港，并在24小时内执行命令，否则将动用武力。中国政府要求各国机构代表、人员、家属及所有外国人在次日晚4点前下旗回国。

外交使团在第一封急件中答复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准备，无法组织家人动身，并询问采取了哪些保证路途安全的措施。外交使团还坚持通知赴北京的外国分队，以便能与他们汇合，另要求翌日上午9点召开大臣会议。

6月20日

外交使团没有接到任何答复，于20日早7点向总理衙门发出第二封急件，要求同海军将领通话，让准备好的分队立即出发，以保证北京外国人的安全，随后可以收复大沽口。

早上9点，根据接到的信息，外交使团尤感形势危险，灾难会随时来临，他们立即发出第三封急件，请求中国政府为外国分队提供所有方便，保留条件是他们不进京，一旦告知到达京城城门，他们便去那里汇合前往天津。

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公爵在法国公使

馆召开的拟定以上急件内容的会议上宣布，他将亲自前往总理衙门，竭尽全力搞清楚问题的症结。他的同事们一再说，前日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至少应该得到解释再行动。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说，他已经宣布9点带着翻译柯达士（Cordeh）前往衙门。我自己也向他特别指出了潜在的危险。他对这些提醒不理不睬，离开时还说回来后向大家介绍同中国大臣会谈的情况。他离开一刻钟以后，随同前往的马夫急匆匆跑来报告说，德国公使被中国士兵枪杀了，翻译受了重伤。他们显然是中了圈套。策划这一阴谋的士兵躲藏在衙门附近的哨所内。他们用枪口威逼德国代表，子弹穿透轿子的玻璃，克林德当场死亡。他们还打伤了随后跟去的翻译。听到枪声后，翻译在轿子里站起来，这样，他没有像公使那样头部中弹，但大腿的上部被子弹穿透。他从雨点般的子弹中逃出来，被一个美国卫理会教徒接收，伤口得到处理后才返回公使馆。

下午2点，总理衙门对外交使团的第一封急件做出答复，承认从北京到天津的路途会有很大危险，如同公使馆到总理衙门的路（很显然，这是为后来处理克林德公爵被害事件开脱），答复要求外国公使事先呼吁政府采取和平方式，并明确说明政府的意图。

外交使团在得知德国公使被枪杀后立即要求衙门对此做出解释，衙门没有答复，但下午4点送来一封信，表示“公使、秘书、翻译亲自来衙

门应该谨慎小心，否则路上有可能招致灾祸”。

下午4点，中国兵民向奥地利公使馆驻防开枪，公使馆人员被赶走。一名被派往那里防卫的法国水兵被击毙。另一名奥地利士兵受伤。按照各分队军官达成的一致，凡已婚人员均被送到英国公使馆官邸。英国公使馆由于面积大、房子多、防卫条件好，被指定为惟一能够给遭到威胁的外国人提供保护的地方。公使们也决定集中到英国公使馆，组成最高自卫委员会，由窦讷乐领导，他在来北京担任大英帝国代表前是英国部队司令。他们认为，分散在各个地方，消息有可能被切断，要击退武力进攻，必须保证指挥的步调一致。晚上9点，战斗打响了，整个使馆区枪炮声大作，我在夫人和西班牙公使的陪同下来到英国公使馆。我的同事先前已经接到命令，提前来到英国公使馆。法国海军和志愿兵被命运推到英勇战斗的岗位上，作为公使，面对前所未有的形势，我自然每天都来到他们中间。根据分队军官的另一决定，奥地利士兵在被迫放弃奥地利公使馆后到法国公使馆驻守。因此，不含志愿兵，我们拥有75名士兵和7名军官，其中47名法国人，35名奥地利人。志愿兵共19人，其中12名法国人，2名奥地利人，1名意大利人，1名瑞士人。

整个夜里，公使馆遭到猛烈枪击。晚上，中国大学的一名美国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被义和团俘虏。

6月21日

外交使团不再答复总理衙门,要求了解各国政府代表的指示。衙门说,各国政府代表均对中国表示友好,除保护在华外国公使们的安全,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外交使团指出,使馆区昨日起枪声不断,希望这只是叛匪或无组织的兵民所为,要求在限期内采取措施。

6月22日

早6点半,我在法国公使馆发现,奥地利分队根据指挥官的要求已经做好撤退的准备。奥地利指挥官是官衔最高、年纪最大的军官,法国部队也由他指挥。他来到舰艇中尉面前。撤退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士兵开始从城墙上向德国人射击,德国人守不住了。我坚持要求抵抗,并就此同赛讷乐商量,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回到法国公使馆,当时公使馆人员还没有被驱赶。但到了8点45分,当我们回到英国公使馆准备与同事们商量应该采取的措施时,意大利、德国、美国 and 俄国公使馆的人都被驱赶出来。公使们同我一样,发出重新占领阵地的命令。命令立刻得到执行。但是,意大利士兵来到公使馆时那里已经火光冲天,他们被迫离开。海关也是大火熊熊。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一栋楼也被义和团点燃了。一个半小时后火才最终熄灭。

6月23日

相对平静的夜晚。

东北风很大。法国公使馆前一夜没有发生什么事,但由于风力很大,有利于犯罪行为,大家都担心什么地方会起火。大约11点,英国公使馆的警钟敲响了,皇家翰林院的一个附属设施起火了,英国公使馆的北墙离那里只有几米远。大家心急如焚,大火几乎烧到了马厩,离马厩不远的地方恰恰是我们的前哨重阵。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才最终控制了大火。法国、俄国、荷兰、美国公使馆附近的楼宇都被点燃。尽管风力减弱了,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中国的大炮从城墙射出炮弹,击中不同的公使馆。

5点,警报频频拉响。翰林院的另一附属设施起火了。学堂受到严重威胁。大楼与邻近的、紧靠公使馆的寺庙之间有一棵直径为50公分的大树,这时大树变成了火团。大树被砍断。半小时后,灾难过去,但翰林院极为丰富的图书馆被毁,里面藏有珍宝、古董,还有刻在两块碑石上的皇帝特令。这是“拳民”犯下的新罪行。通宵枪声未断。

6月24日

大约上午11点,成群的兵民和义和团团员疯狂地叫喊着攻打英国公使馆。公使馆的一扇大门从里面用石头和一个个土袋加固起来,结果大门

被子弹射成了筛子。射击持续了大约45分钟。我们在旁边的墙上开了个洞，海军从那里击毙了许多士兵。兵民和义和团团员们吼叫着往后撤。大火肆虐，华俄银行也被火焰吞噬，周边的房屋被摧毁。在其中的一间房内，我们的海军杀死21名士兵。

德国人和美国人占领了城墙。他们试图在中国榴弹炮中筑起街垒，加固失而复得的街垒。尽管遭到攻击，他们还是借黑夜完成了街垒的打造。早上5点，义和团团员和士兵似乎全部到皇宫周围驻守。据说，有一扇连着墙体的大门，他们就是在墙内实施的屠杀，那扇门离英国公使馆不远。他们野蛮地吼叫着，谁也不知他们到底奔向何方，要攻打何人。

6月25日

早上似乎还算平静。但10点钟的时候，各地突然出现了枪杀：英国公使馆的南、西、北三个方向，各个公使馆方向，还有躲藏着2300名中国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地方，都成了义和团和清朝士兵进攻的对象。这个称之为肃王府的地方是一位大臣的豪宅。这是一个规模壮观的花园，内有参天大树、高大的阁楼、宽敞的房屋。肃王府位于法国、日本及英国公使馆之间，与其相通。王府的保卫交给了日本人，由原巴黎军事专员史帕（Shiba）上校指挥。意大利分队开始承担保卫任务，在公使馆被毁之后来到这里筑巢。奥地利和

法国公使馆长期设防，必要的时候，还有英国的增援。这里围墙高筑，是密集的使馆区要地，因为，如果占领了此地，中国人至少可以切断法、德、日三个公使馆的联系，或强迫他们躲进英国公使馆。而英国公使馆恰恰在敌人的火力攻击范围内，可以在公园的墙上打洞射击。公园的墙与英国公使馆的墙并列，且更高，从那里射击，即使是最笨的枪手也不可能失手。

枪声连续不断，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随后传出可怕的喧嚣，子弹横飞，还夹杂着炮击声。我们这方面由于弹药短缺，只有零星的反击。形势紧急，美国人时而放弃城墙，时而又夺回城墙。义和团就在王府的一座高墙下，他们企图摧毁这面墙。我们从洞口朝他们射击，但不见成效。我们的损失惨重：1名法国水兵、1名日本兵和1名德国兵被杀，很多人受伤。

5点钟，战斗突然停下来。一块高大的牌子立在英国公使馆北面的桥上，就在皇宫围墙附近。上面写的是：“钦奉懿旨，力护公使馆，严禁开火。”圣旨从御河桥传出。

很长时间内，只是偶尔听到零星的枪声。人们揣摩着是真的和平还是暂时休战。一些人认为是真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在演戏而满腹狐疑。然而，了解中国人的人并不怀疑。很快真相大白了，进攻美国和俄国公使馆的战斗又打响了。幸好事先有防备，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大家只要觉得有陷阱，弦就绷得紧紧的，甚至达到围困



以来的最高峰。似乎有张布告，通知晚上会有人来送急件，但最终任何人都没有露面。只有几个中国人过桥，听说其中一个这样讲，荣禄接到圣旨，命令张贴。但只是告示，因为，夜里突然间又发起了全面进攻。先是可怕的枪击，枪弹声喧天，远远超过白天的阵势。黑夜中，子弹横飞，撞击后发出吼叫，打在墙上传出啪啪的响声，砖砌的房顶被掀掉。每个人都冷静，没有像白天那样拼命反击。凌晨1点，枪声停了下来，但偶尔还依稀听到零散的枪响。只是该送来的急件虚无缥缈了。

6月26日

中国人在使馆街筑起了一道街垒，就在离俄国使馆街垒不远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开枪射击，打了整整一天。子弹打到法国公使馆内，还有前门那两门大炮打出的炮弹弹片。初夜在法国和德国公使馆方向发生的枪杀十分激烈，很快便蔓延开来。早上3点，英国公使馆附近的枪击达到顶点，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后来虽逐渐减弱，但扩展到各个角落。

一位名叫吉特(Gietor)的在中国京师大学堂任教的志愿者脑后部中弹，穿到颈部下方，头皮下端。子弹后来被取出，没有伤到骨头。

6月27日

枪杀持续不断。接近10点，其范围扩大。这

时，英国公使馆东北墙受到攻击，枪声此起彼伏。枪击很快蔓延开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猛烈。法国、英国公使馆成为主要攻击对象。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王府被进攻者占领。我们派人加强防守。当中国人打开洞口的那堵墙失陷后，日本人乘机从背后包抄，打开一道战壕，清扫了广场。直到晚上8点，愤怒的进攻者才慢慢平静下来。

当时，我和贝尔多(Berteaux先生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在枪林弹雨中通过王府到法国公使馆，因为使馆街已经不能走了。弹片随时从我们身边擦过，穿过房顶或墙壁，但由于机枪手的笨拙，子弹通常在空中飘舞。

晚上10点，就在我们居住的房子后面，枪击又在英国公使馆开始了。一时间子弹横飞，但又很快停了下来。20分钟后出现了寂静，一直持续到天明。

6月28日

中午以前，英、美和俄使馆区很安静，偶尔听到两声远方飞来的炮弹或子弹弹片，没有什么伤害；法国使馆区就不同了，从前一天夜里开始根本没停火，下午4点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埋伏在大门口和烧成灰烬的房屋瓦砾中，朝墙和街垒开枪，有的人就在意大利公使馆残存的高墙上开枪，给我们的人造成很大伤害。我们的人扔出浸了石油的草，终于点燃了敌人的一个街垒。我们目睹了奥地利事务大臣和他勇敢的妻

子纳色恩 (Rosthorn) 夫人参加战斗的情形。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中国人还有三面特大旌旗，从那里发出疯狂的吼叫，将石块投向我们躲避的高墙上。燃烧的木块落在纳色恩夫人身边，她的脸、手和腿被严重烧伤。

我回到英国公使馆后，枪击开始。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中国人成功地把一门大炮安在一个小楼上。我们观察到，他们在房顶上打洞，拆毁房屋，威胁说要把房子搞塌。我们朝他们开枪，最终迫使他们放弃了。危险只是暂时避开了。整整一夜，进攻没有停止，甚至变本加厉。但没有造成其他后果。

6月29日

我们进入灾难发生以来最艰苦的一天一夜。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一共射出170发炮弹。枪击没有停歇，同时伴随着进攻。事情发生在白天，我离开法国公使馆的时候爱尔博准尉还那样生龙活虎，勇敢无畏，几分钟后却被杀死在法国公使馆的一个房顶上。马厩是其中的一部分，已被火焰吞噬。只有放弃外面的街垒，躲进室内，加固防卫。实际上，房子已经被打了两个洞。达尔希 (Darcy) 中尉领导我们分队，他的勇敢令人敬佩，他对我说，“形势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奥地利和法国的海军，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大家也都是不屈不挠；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晚上10点，我们房子后面的英国公使馆又开

始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枪击。同时，雷阵雨也下了起来，闪电划破了天空，发出一道道光亮，沉闷的雷声隆隆作响，大雨瓢泼而下。我们的灵魂和内心被野蛮吞噬，但大自然展示的却是仙境般的图画。这可怕场景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随后是零星的枪声，5点以后逐渐平静下来。

中国人试图通过一个洞口打进法国公使馆。他们死了很多人，德国公使馆也是损失惨重。

6月30日

中午以前一共射出71发炮弹，枪击也很激烈。英国公使馆随后彻底平静，但法国公使馆仍发生规模不大的进攻，两个公使馆的连接部分起火。我们的人也适当后撤，躲到墙脚下，在几米外的地方窥探中国人，透过枪眼用枪瞄准他们。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德国人在占领的街垒和城墙上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7月1日

令人伤心欲绝的一天。早上9点，我在法国公使馆，德国军事官员急匆匆来宣布说，前门的美国人和哈德门的德国人被迫离开建在城墙上的堡垒。形势严峻，我立刻回到英国公使馆，要求派兵增援，并请求下令夺回失去的阵地。赛讷乐的命令刚刚落笔，法国志愿兵铁士兰 (Picard-Destel) 跑来报告，从最远不超过150米地方打来的一枚炮弹摧毁了海关街公使馆的墙，原上海



总领事的儿子瓦聂先生遇难。我们的分队集中撤退到北京饭店。庆幸的是，我很快得到消息，我们的撤退是暂时的，我们撤离的地方又回到自己的手中。

另外，美国人在国防委员会的指示下和援兵的帮助下，又重新回到城墙上，夺回了失去的堡垒。但由于德国人损失惨重，所剩人员寥寥无几，无法守住阵地，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一天，炮弹在法国公使馆周围爆炸，叫“蜂厅”的前厅大堂柱廊被炮弹穿了很多大洞。炮弹掠过英国公使馆上空，枪杀在继续。死亡人数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多。在意大利上校保利尼(Paolini)的指挥下，王府里开始第一次勇敢的突围，目的是抢夺摧毁高墙的大炮。执行这一任务的小分队的对手是中国抵御能力强大的堡垒，子弹从街垒里射出，2名意大利人死亡，保利尼上校和1名法国下士受了伤。

我同法国公使馆大部分人员和瓦聂先生的同事、海关行政人员一起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气氛尤为沉重，沮丧和惊愕笼罩着墓地。子弹在我们的头顶上咆哮，炮弹的吼叫声还掺杂着撞击后的隆隆长鸣。

法国公使馆一直到晚上都始终处于对方的打击下，但没有失陷。二十多名中国人被杀，而我们没有遭受新的损失。夜晚比较平静地过去了。但在英国公使馆，这一夜并非如此，从晚上8点至早上4点根本没有间歇。

接近10点时，英国公使前往观察已经多次出现的空中的光亮（尤其是6月29日和30日夜间）。“这当然是行进中的欧洲军队发出的信号。”他还特别肯定地补充说，在南非曾经用过这样的信号，当时他们被“狂人号”运送到那里，现在停泊在大沽。他的描述不可能让人产生怀疑。使用信号的军队离北京只有48小时了。这么确切无疑的消息让人着实松了口气。但失望与日俱增，疑虑尚存。

7月2日

使馆区没什么大事，王府那里枪击猛烈，在两门大炮的轰击下，原来的墙洞口越来越大。日本人从占据的前锋阵地败退下来。晚上，史帕上校表示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坚持。

夜里，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街垒对面拔掉了一个中国人建的街垒，街垒相距只有25米。中国人建的街垒比我们的坚固得多，想想他们拥有的苦力的人数，这也不足为奇。我们是用刺刀把敌人赶出去的。敌人遭受很大伤亡，包括他们的鼓手。我们这方死亡2名水手，1名美国上尉受了伤。战斗打得非常漂亮，参加战斗的人从中受到极大鼓舞。中国的街垒从此被美国人和俄国人占领，并成为我们的主要保护设施。

城墙上在继续战斗，英国公使馆在同一时间遭到攻击，但没有伤亡。最危险的地方还是王府。早上5点，炮弹雨点般向那里飞去。大家越来越

担心，问增援部队能否来，离北京还有多远，雨不停地下，他们是否会因水灾被困。

7月3日

除偶尔零星的炮弹外，一整天都很安静，而且炮弹也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晚上，中国人举着八面旗旗集中到法国公使馆周围。11点，他们开始猛攻。炮弹把大街门穿了个大洞，还穿透了北京饭店前面那条街的街垒。一阵猛攻后，中国人见我们的人没有任何损伤便停了火。

晚9点至早上3点，英国公使馆周围的枪声密集，还掺杂着不少鞭炮。美国的街垒受到强烈的攻击，但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7月4日

一天下来，枪声不多，但大概有200发炮弹打向北京饭店方向。有的击中了饭店，二层的房间出现了大洞。

夜里，法国公使馆遭到约45分钟的枪击，英国公使馆大约30分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问题。

至此，公使馆保卫力量死亡达35人，其中7名法国人，6名德国人，6名意大利人，6名美国人，5名日本人，3名奥地利人，2名英国人。显而易见，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最惨重。

7月5日

布鲁亚(Brouillard)先生是汉口-北京铁路段工程师，他给我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中国人打击我们使用的炮弹口径，有的是根据各地拾到的碎弹片标出的。大概有4种：克虏伯0.07和0.055型，0.037有膛线的小炮和0.05轧光炮。还有3磅、6磅、12磅老式圆炮弹。许多圆炮弹是中国士兵从皇城墙墙上建造的平台射出的。其中两发炮弹摧毁了英国公使馆的阁楼。这一天，射向法国公使馆的炮弹都很准，多数都击中目标。教堂被击中，食堂房顶几乎完全被毁，房顶大部分坍塌。再没有比我们的公使馆更惨的了，遍地是瓦砾和树杈。为保护大树，我们将被子弹和弹片击断的枝干切断。空空如也的园子里仍然站立的只有几处千疮百孔的房屋。虽然奥地利和法国海军同我们的志愿兵住进了帐篷，但他们的幽默和勇气未减，他们没有降临的悲痛和灾难压垮。

除四处依稀传来的警报声，这一夜相对比较平静。

7月6日

一天中有一百多发炮弹射出。枪声很少。大家继续在英国公使馆内捡拾老式圆炮弹弹片，这些炮弹穿透了北房的墙。在王府，日本人上午遭到猛烈打击。他们试图突围出去，抢夺中国人的大炮，结果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损兵折将，失去



1名军官和1名水手。另外，1名中国志愿兵死亡，1名日本人受伤。一夜静悄悄。法国公使馆和王府仍在枪击之下。中国人在皇宫城墙上离英国公使馆房屋大约50米高的地方搞了建筑，他们建议把大炮放在上面。建筑像个大平台，前面还有流动遮掩物保护，防备我们的前哨射出的子弹。

7月7日

早上，在法国公使馆，有人对我说，听到城南方向有密集的炮声。达尔希中尉非常肯定地认为，在离北京10公里远的地方将有一场战斗打响，这只是前奏。奥地利指挥官赞同他的观点。我自己觉得炮弹声要更远些。我要去英国公使馆宣布这一消息。这不会又是幻觉吧？

下午3点25分，中国人已经射出122发炮弹。一发圆炮弹穿过英国公使的餐厅，擦伤了装有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的镜框。炮弹射击持续了整整一天，法国公使馆始终在炮火攻击之下。中国人蹚入了地下室旁的院子，其中十几个人被杀死，其他人跑掉了。翻译索赛（Saussière）先前住的房子的厨房变成了火海。我们被迫向后撤退。我们的阵地日渐缩小。

傍晚，英国公使馆想出了一个绝招，并开始实施。一门意大利小炮的炮弹几乎用光了，于是把在中国人屋子里找到的锡装在弹壳里使用。另外，大家还在隔壁商店里发现废弃的炮弹。这种炮是从炮口上装炮弹，没有准星，整个是锈弹。

一位美国分队的军械师把它整旧如新，还给它配制了发射体。大家把这门炮命名为“the Empress Dowager”（皇太后号）或“Betsy”（贝特西—Elizabeth 昵称）。大家给大炮准备炮弹，同时准备用俄国人带来的炮弹，因为使用这类炮弹的大炮留在了天津，所以始终还没有派上用场。

7月8日

炮声四起，从早到晚。到夜里，人们数的结果是总共325发。中国人又搞到新武器，他们的炮弹更先进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法国公使馆和王府。我刚到达公使馆便听说奥地利分队指挥官托马（Thoman）先生被打死了，炮弹打在他的前胸。这是一位出色的军官，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死使我们这小小的军营笼罩在悲痛之中。命运的嘲讽是这么残酷，他本不该随奥地利护船队来北京。“Zenta”战船供他使用，由他担任指挥，他之所以随船来，是打算把船送到目的地后尽快赶回船上。可他同天津失去了联系，这使得他不能再去指挥战舰。我们所在的院子角落里有块墓地，墓地下安息着他的许多部下和我们的士兵（他们都是近日来集体或单独阵亡的将士）。正当我们给他献花时，子弹突然穿过院墙，在空中飞舞。大炮摧毁了第一位翻译莫利斯（Moris）曾居住的房屋。我们的屋顶坍塌，室内瓦砾堆积如山，檩条和房梁断裂横卧。尽管如此，水兵英勇顽强，仍在抵抗。火舌向他们袭去，街

垒开始一点点沦陷。然而，他们躲到火焰后面，顶着炮火拼命反击。只要能够坚守，他们绝不会丧失阵地。他们挖战壕防身，躲在临时搭起的街垒后面，甚至冲到敌人的人群中，或到中国人疯狂追赶的教徒中间拼搏。“贝特西”射出圆炮弹，带着隆隆的巨响飞向放火的人群，迫使他们逃命。这些人根本没有作战方法，虽然军队装备精良，但胆怯和无知等于卑鄙，成为一小撮绝望之人失败的原因。

7月9日

一天总共发射210发炮弹。法国大使馆遭到破坏有增无减。继翻译的房屋和公使的餐厅被摧毁，轮到大厅遭殃。放火的人在隔壁的街道遭到突然袭击后被子弹击毙。从其中一个人的嘴里得知，西什库的北堂至今没有遭到任何焚烧，也没有被占领。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北堂的消息。

动荡不安的一夜。从晚8点到早7点，射出50发炮弹。两发圆炮弹落在我们居住的房顶上。“贝特西”懒洋洋地回复了中国伙伴。专为意大利大炮发明的炮弹也不尽如人意，炮弹太小，命中率太低。有8发是从法国大使馆发射的。

美国大使馆接到消息，说北京很静，官方报纸还在出版，称慈禧太后仍在宫中，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欧洲军队的消息。有一点得到了确认，即北堂安然无恙。

7月10日

中午前共发射70发炮弹。大概有15发落在我们门前。其中一发炮弹的弹片穿墙而过。下午共发射约40发，夜里20发。英国大使馆比较平静，但法国大使馆和王府内刺耳的警报不断。情况日益严重，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四处飞溅，只有战壕壕沟的高度，子弹从弯着腰隐藏在战壕里的战士身边掠过。

7月11日

早上，16个放火者在法国大使馆附近被击毙。另外两个俘虏说，中国人在地沟里放置了地雷，要炸毁法国大使馆。于是，我们决定让地沟大白于天下。中国人称不知道欧洲军队是否到来。

一天中共发射95发炮弹。王府遭到猛烈攻击。2名日本水手死亡，1名志愿兵受伤。我们派到战壕干活的一个中国人也死了。夜里，英国大使馆没有大的动静。又有二十多发炮弹射出。

7月12日

早上8点30分，比利时公使秘书麦令豪（Merghelynck先生（法国志愿兵）带来了他俘虏的义和团团员。据此人称，只有大沽防御彻底被外国军队占领消息才会到达北京。这个港口停泊着一百多艘战舰。皇帝和太后等待端王、荣禄和董福祥掌权后才会回到北京。庆王不属于他们的



阵营。太后支持攻打公使馆领地，但她拒绝为攻打公使馆的中国人提供康熙年间制造的大口径大炮。她这样做并非因为同情我们的人！她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担心笨拙的军队不小心摧毁完美的城市和效忠的平民。敌人丧失了两千多条性命，于是我们成了他们眼里极为危险的人物。他们大概想通过饥荒让我们屈服。

下午，另一名法国军团志愿兵伯希和(Pellib)先生送来从敌人手里抢夺的战旗。这是荣禄军队的右翼军旗，荣禄部队在待命上任的李总兵指挥下。这面军旗被夺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疯狂地向我们发起进攻，严重击伤志愿兵昆根的喉咙，另一志愿兵肖莱(Chole)先生的手受轻伤。另两名水手也受了伤。

英国公使馆也因同样的原因受到疯狂的攻击：董福祥的一面军旗被夺。公使馆的墙壁和前哨被打得千疮百孔。一天一夜共发射200发炮弹。王府内的机枪和炮弹声尤为激烈。一名意大利海员被击毙。替代保利尼的意大利公使馆秘书受了伤，他是塞尔蒙达(Sermonetta)公爵的儿子，一个炮弹弹片掉在他身边，他被掀起来，浑身是土。值得庆幸的是弹片没有击中他。

7月13日

英国公使馆和王府上午遭到一百多发炮弹的袭击。枪击声在法国公使馆夺取军旗的地方仍在继续。从前一天开始，中国人便试图切断公使馆

间的电话联系。我们面对危险下了赌注：在连接王府和英国公使馆的河道两旁筑起坚固的街垒。但是，从我们的临时住所到水手仍在坚守的废墟，大批子弹和炮弹片在过往的街道和院子里横飞。我们收集各种口径的圆炮弹片，捡拾落在街道及院子周围的炮弹片。

炮弹从教堂的四周射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猛烈。夜幕降临，突然，法国公使馆处的炮击声和枪击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的人数达到最高水平。英国的小巡逻队说，他们听到法国公使馆方向一次或多次爆炸声。这一点很快得到了确认。地雷爆炸，索赛先生的房子被炸毁。担任22点巡逻的领班帕斯科先生和一名水手丧命在废墟中。奥地利特使纳色恩先生及铁士兰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达尔希中尉的头部受了轻伤。敌人手举火把闯入坍塌的房屋中。随着地雷爆炸声，大火熊熊燃起。蓝色大厅、其附属建筑物、温室、大厅和小厅、饭厅、我的卧室和工作间瞬间消失，我个人拥有的一切和国家四十多年留下来的财产和公使馆运行所需的一切全部消失了。

我们的水兵被迫在枪林弹雨中撤退，撤到白天挖好的战壕里，战壕连接着一座北街的房屋。我们的防线是这样确定的：神甫房、小教堂、外国人的阁楼、一秘的房屋和从那里开始的战壕。机枪排迎接偶尔闯入花园的中国人。最终迎来了相对的平静。德国人上了刺刀，杀死四十多名士兵。同时，美国人也从城墙向下清扫义和团人蹿